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系统及其历史开放性

金民卿*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就是被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之中、被主体加以结合的对象,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一个是理论客体,一个是实际客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指导思想而不是一般理论、是次生态而不是原生态、是以解决实践问题而不是以追求理论完整性为中心;中国具体实际是一个包括了民族特点、文化传统、国情状况等在内的总体性系统,对于这些客体要素的把握程度是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程度高低的重要尺度。主客体之间、两类客体之间的互动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开放性。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具体实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就是被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之中、被主体加以结合的对象,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前者是理论客体,后者是实际客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实质、主体等的分析是比较丰富的。相比之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体的分析则显得不足。而这种不足也难免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留下一些值得注意并不断引起追问的问题:中国人所接受的是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不是实用主义地裁剪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国实际究竟包括哪些内容?这些问题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进程以及当代发展等的探索;而搞清楚这些问题,“就不仅仅是理论工作者的时代任务和理论担当,更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能否‘凝心聚力’、‘全神贯注’地聚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①,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政治问题和路线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仔细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系统,不同客体的内在规定性,不同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的影响。

*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00732。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16FKS001)的研究成果。

①杨嵘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历史认知、实践定位与哲学意蕴》,《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客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变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用以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对象,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指导思想,作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行动指南而存在的,而不是一般性的学术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体系统中,马克思主义只是理论性客体,在它之外还有中国实际这个实际性客体。是否被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当中,是否成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对象,这是判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和能否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体的基本标准。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产生,但它长期没有被引入中国,没有被中国人所了解。当时的中国人尽管已经开始探索摆脱危境的道路,但尚不知道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已经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这种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纯粹的“自在之物”。在此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与中国实际结合到一起,当然也就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

19世纪7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名词、个别观点,开始零零星星地被译介到中国文化系统当中,一些先进的中国文化人逐步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只是不自觉地作为外在的知识要素被引入,没有被作为理论参考更没有作为指导中国变革的指导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之间没有出现交集。也就是说,零星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片段,尚处于中国人的理论视野之外,也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

辛亥革命前后,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很多都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孙中山曾经讲过,自己对社会主义是“竭力赞成之”,希望对社会主义学说“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并说“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①。但孙中山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只是一种解决社会生计的改良主义政策,即他所倡导的民生主义,“至若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②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朱执信先生,在其所著的《马尔克 Marc》一文中,^③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以及社会主义学说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还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介绍于吾同胞”,“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当然,朱执信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他只是把马克思的学说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借鉴加以引进,而没有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准确。例如,他在介绍剩余价值学说时,认为这个学说对于揭示资本剥削是准确的,但资本起源理论则“立言不审时或沿物过情”,“马尔克之言资本起源,不无过当,而以言近日资本,则无所不完也”;他在谈论社会主义时,总是把它看作是解决民生的途径,而不是看作人类解放的途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没有得到高度重视,更遑论用这些理论来指导中国具体实践了。

只有到了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成为中国最先进分子的根本指导思想,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

^①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08页。

^②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册),第368页。

^③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册),第126—135页。

结论。”^①“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②当此之时，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体的组成部分。

第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客体的马克思主义，始终被作为指导思想、行动指南和理想信仰，而不是一般性的学术理论。五四时期，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始，就不是把它作为个人兴趣或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作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经过一番曲折的。早在湖南一师期间，他就渴望寻找改造中国的“大本大源”，即对行动有根本指导意义的思想理论，他长期坚持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实验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无血革命”、“呼声运动”加以推崇，把实验主义看作是人类思想解放的标志。但是，实践是无情的，在经过多种实验之后，他发现这些主义都是“理论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③于是，他进行了深度的思想清算，放弃了各种不正确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信仰和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1920年11月25日，在给罗章龙的信中，他提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趋赴。”^④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同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他对蔡和森所主张的“马克思的方法”，“表示深切的赞同。”^⑤1921年元旦，他在比较了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几种思潮之后明确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是最有效果的，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最宜采用”，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他坚定不移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通过马克思主义这根指针，毛泽东同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找到了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改造和发展中国的钥匙。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进程中，以毛泽东同志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拓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本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个别词句或一般性的学术理论。1938年，他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之时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是一般规律，是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教条，不是个别词句。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写进党章和宪法当中。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但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理论信仰的性质，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这一点必须要加以强调，否则就会出现因为新发现马克思的某个新观点、或因为需要而突出强调某些理论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倾向，出现因为提出创新观点而否定基本理论的倾向。

第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客体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以中国实际需要为依据、以解决当时实践问题为中心而被接受和坚持的。这个特点又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以理论精髓形态进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当中，而后才逐步获得完整形态的，并且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会被突出地提到实践和理论的前沿。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才真正进入中国思想界，但是它并不是作为整体性的理论形态，而是以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精髓观点的形态进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4页。

③《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页。

④《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7页。

⑤《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8页。

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

入的。李大钊在其开创性的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主要抓住了同当时中国具体实际密切相关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而对其他的理论则并没有全面涉及。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根本指导思想时，也是着重接受了与中国实际需要密切相关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自己在讲到马克思主义时还把它简化为“阶级斗争”四个字。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化，完整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被人们所熟悉和接受。在把握了完整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地根据具体实践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观点提升到理论的前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必须以实践为中心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解决重大实践问题、回答重大理论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和创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研究，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和时代引领。”^①

第四，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客体，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次生形态而不是原生形态引进的，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直是在回归和创新的交替中展开的。19世纪后期，洋务派、维新派的思想家们是从欧洲人的一些著作中零零散散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不仅不能完整地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绝大多数是不准确的甚至是歪曲的。20世纪初期，留日学生、维新派思想家、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等，大多是从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

五四时期，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也是从日本学者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被学界称为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北李南杨”。仔细分析这两篇文章的内容就可以看出，它们基本上是根据日本学者的观点整理的，而且在核心思想上同朱执信的《马尔克》、王缙尘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有很多相仿之处。这是因为，不仅朱执信、王缙尘，而且李大钊、杨匏安等，都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五四运动后，包括蔡和森、周恩来等赴法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又开始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多是从俄国人那里引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对此曾说过：“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②也就是说，从理论渊源上看，中国人从一开始是通过不同渠道接受了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接触比较少。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逐步被系统地翻译过来，人们更加注重从经典著作中把握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客体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形态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也不可能终结。近年来，人们不断提出“回归马克思”、“还原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的观点，就说明了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质疑，认为中国人长期以来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的、或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必须要回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这些观点从学术探讨的意义上有一定价值，能够让人们更好地、更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如果据此来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则是不正确的。

^①王永贵等：《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人虽然在开始时没有也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完整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覆盖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论断,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向和总体进展。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比较准确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些人要求中国人应该先完整地阅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然后再开始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一些人甚至提出,因为中国人从一开始不是从马克思的原本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或者是“偏离了马克思”。这些观点实际上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主观想象,是自以为是的苛求前人,或者是以原生态、完整性的名义来攻击和抹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创新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客体: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构成及其深刻变革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中国具体实际是通过发展主体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的对象,是一个包括了中国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特点、现实矛盾状况、外部环境和时代特征等在内的总体系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中,这个总体系统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第一,民族特点是中国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重视和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的特点,是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成熟与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程度高低的重要尺度。青年毛泽东在分析俄国革命经验时,就强调要从中国实际来理解和运用十月革命经验,而不能离开中国具体特点照搬照抄。1920年9月,他写道:“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什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工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①这就是说,俄国的十月革命非常成功,如果中国也能够像俄国那样,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实现彻底的、根本性的社会改造,那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是,中国的国情特点与俄国不同,缺乏十月革命的实际条件,因此必须走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同俄国革命不一样的路子。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对民族特点重视程度不够,直接照搬外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本本”,出现过比较严重的曲折。毛泽东同志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之时,就高度强调民族特点问题,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民族特点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使之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②。他还专门带领学者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特点作了分析概括:“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等等^③。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6—4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2—623页。

新中国成立之际,选择什么样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选择。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一体多元”是中华民族的鲜明特征。这个特征决定了中国既不能采取完全的民族自决政策,也不能实行完全的民族一律。因此,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极端重要。为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华民族具体特点结合起来,按照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制定了一套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探索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民族精神更是高度重视,强调要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正如习近平所特别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①,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第二,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以及在历史上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群体以及理论家们,高度强调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学习把握、实践运用和转化发展。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就特别强调要学习研究和继承发展中国历史文化:“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②

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讲道:“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③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融合起来的典范,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深植于中国文化之中,而且“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形成了中国优秀文化发展的最新形态,“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④

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继承和发展历史文化的科学方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中国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不同文化环境和时代背景,文化内容与性质也不相同,二者不可能相互取代也不能相互取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通过把二者进行差异融合,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推进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转化。

第三,反映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特征的国情状况是中国具体实际最重要的内涵,对中国国情状况的把握程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国情状况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⑤正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毛泽东深入分析中国的现实状况,深刻把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对中国具体国情作出了

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8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④《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9、335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

科学判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探索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在八大报告中对我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发展阶段等做出了科学分析。关于社会性质问题,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家的内外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①关于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②关于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问题,报告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主要矛盾,“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③关于国情特点问题,毛泽东多次讲到,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同时是一个穷国,“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④;就是“一穷二白”,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水平比较低,文化程度比较低;人口多,底子薄,要赶上发达国家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在1959年底,毛泽东做出了我国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论断。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等人深入分析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但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判断,提出一切决策都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决不能超越阶段也不能罔顾事实,必须牢牢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可以说,“党带领人民历经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层层考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接续发展和人民自主选择的生动体现。”^⑤当今世界和中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面对新的任务、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追随时代发展进步的步伐,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把握时代特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深入分析和科学回答重大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开放性:两类客体以主体为中介的结合与互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主客体之间矛盾关系的展开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在推动两类客体结合的过程中,自身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完善,两类客体之间也相互影响、共同发展,这种主体与客体之间、客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运动,是一个日益深化的历史开放性过程。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在主体的推动下展开的。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中国具体实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都是对象性的、受动性的要素,二者的结合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发生,必须经过主体的主动性努力才能够发生和推进。没有主体的自觉结合,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发展主体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真理性和实践指导性,把它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另一方面,发展主体深入把握中国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用马克

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09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10页。

③《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3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页。

⑤王永贵,路媛:《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独特优势——学习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理念的重要论述》,《理论探讨》2016年第6期。

思主义来分析和引导中国具体实际的发展。也就是说,正是通过主体的自觉能动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获得了历史必然性同主体能动性的真正统一,才真正成为现实性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主客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作为理论客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作为实际客体的中国具体实际,相互之间也交互影响、双向互动,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不断展开而不断更新和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客体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凝固不变的,而是在同中国实际的互动中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着变化。首先,正是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从一开始的个别观点引入到基本观点和理论精髓的传播,再从基本观点和理论精髓的传播运用到整体理论的引入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完整性、系统性,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本质和思想内涵,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接受、传播、运用。其次,基于中国具体实际的需要和中国实践任务的转换,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不同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被突出地提到前沿,成为宣传、运用和发展的重点。建党初期,中国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革命的根本方法,因此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等成为宣传、运用和发展的重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突出地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来指导,于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思想成为重点;建国前夕,建什么样的国家和怎样建国成为急需解决的实践问题,于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又成为重点问题;建国以后,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此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则成为重点。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相互交融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不断被赋予中国的具体形式,获得了中国风格、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并在吸收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破解中国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创新成果,使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显示出其时代价值。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体的中国具体实际,也在同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结合中不断改变着自身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此,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做了非常深刻的概括:首先,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其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再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①这三次伟大飞跃使中国社会性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改天换地的根本变化。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升级。中国具体实际发生的这些根本变化,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完善。“大体而言,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程主要

^①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经历三次重心转移,第一次是从社会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重心转移;第二次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重心转移;第三次是从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心转移。每一次重心转移都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①

正是在主体、客体不断变化,以及二者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越来越走向深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主体来看,各类发展主体将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中,在学习、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一代一代地获得历史连续和发展壮大。从中国具体实际方面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无限发展的,实践将不断提出新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理论创新给予回答和解决。从马克思主义自身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它将随着社会实践和时代特征的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不断丰富完善。通过主客体本身的变化发展以及它们之间互动关系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会一直处于开放发展的进行时中,并在开放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形成阶段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

(责任编辑:杨嵘均)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ts Object System and Historical Openness

JIN Min-qing

Abstract: The two key elements which are unified into an organic whole constitute the object of the Marxist sinicization: one is the Marxist theory and the other Chinese reality; the former is a theoretical entity and the latter a concrete one. As an object of the Marxist sinicization, Marx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its derivative rather than original form and has since been accepted as a guideline rather than a universally-binding theory: its main purpose is thought to solve the concrete problems rather centering on the pursuit of theoretical completeness. The Chinese reality is an overall system consisting of such elements as the national character, cultural tradition and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extent to which all these elements are grasped by the subject of sinicization forms the key yardstick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nd that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object determines that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varies with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ditions, hence its historical openness.

Key word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object;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Chinese concrete reality

^①王文兵:《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张力》,《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